

“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李白笔下的九江，如同一幅绝美的山水画卷，流淌在岁月的涟漪里，令人心驰神往、沉醉其中。

九江简称浔，古称柴桑、江州、浔阳，位于江西省北部，因“众水汇集的地方”而得名，有“三江之口，七省通衢”之称，万里长江、千里京九、八百里鄱阳湖在此交汇，自古就有江山眉目之地、兵家必争之地的美誉。

历史悠久 文脉悠长

九江秦朝设郡，汉代筑城。在2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记载了“日对千桅杆，夜观万盏灯”的繁华盛景，铺展了“九派浔阳郡，分明似画图”的壮丽篇章，演绎着“唯我九江，气宇不凡”的豪迈情怀。

春秋战国时期，九江为吴国西境、楚国东境，素有“吴头楚尾”之称。秦始皇统一中国，分设36郡就有九江郡。汉朝时，车骑大将军灌婴在湓浦口筑城，为九江建城之始。明清时期，九江是齐享“三大茶市”“四大米市”的城市。清朝时期，九江海关一度是全国最大的钞关，关税收入占全国的1/8以上。新中国成立后，九江是全国首批5个沿江对外开放城市、长江沿岸10大港口之一，也是江西唯一沿江港口城市。

九江是中国田园诗的发祥地、山水诗的发源地、山水画的成长地。陶渊明开中国田园诗之先河；周敦颐在九江开堂讲学，传授理学；黄庭坚开创形成江西诗派，影响了南宋一代诗风；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沈周的《庐山高》，标注了山水画的新高度；陈三立开创了同光体诗派。据统计，历代有1500多位诗人在九江赋诗作词，总数超过1.6万首，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李白的《望庐山瀑布》、苏轼的《题西林壁》、白居易的《琵琶行》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过的城市



□ 刘文华

九江：长江经济带的绚丽纽带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自古以来，人们把长江流经九江的这段江面称为“浔阳江”。在这条数百里的浔阳江上，传诵着白居易与琵琶女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不期而遇；书写着苏东坡月夜泛舟写下《石钟山记》的务实探求；见证着公瑾当年雄姿英发操练水军的壮阔景象；记录着明代开国君王朱元璋与陈友谅争夺天下的激烈鏖战……深厚的长江历史文化资源，是九江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坚固基石。2022年以来，九江以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为核心，聚焦“堤岸防洪能力、堤外绿化品质、堤内园林景观、公园文化品位”四大提升，扎实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和展示九江文脉，将各色景点串珠成链、连点成片，也将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串联起来。

红色基因 薪火相传

九江是一方人杰地灵、英才辈出的红色沃土，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新征程，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中，红色的火种一直在这片热土上薪火相传。

回眸历史，九江城见证了一个个载入史册可歌可泣的光辉时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九江青年在江西率先响应，倡导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五四宣言》的起草者许德珩，就是九江人。1927年，九江地方党组织领导九江人民，一举收回被英国租用长达66年的租界。九江是八一起义的主要策源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在九江修水升起，秋收起义第一枪在九江修水打响，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西线起点也在九江。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奋进，总有一种精神令我们昂扬。1998年，九江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长江水位超警戒3.53米。8月7日下午，九江大堤四号闸、五号闸突然陷落决口，江水涌入城区。在洪水即将吞噬九江城区的紧要关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统一指挥下，2.4万名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以及九江广大人民群众，以超人的勇气和惊人的毅力，连续奋战六天六夜，成功堵住了决口，降伏了洪魔，捍卫了人民安全，创造了在世界第三大河流上、在超历史高洪水位情况下堵口成功的奇迹。时光荏苒，“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

利”的抗洪精神，已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深深地镌刻在九江大地上，成为九江人战胜前进道路上一个又一个困难挑战的不竭动力，不断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2023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时隔4年再次考察江西，首站来到九江。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习近平总书记登上琵琶亭远眺长江，冒雨沿江堤步行察看沿岸风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江是长江经济带的纽带。无论未来长江经济带怎么发展、发展到哪个阶段，都不可能离开长江的哺育。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出发，着眼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把长江保护好。

作为长江哺育的城市，九江人民对长江的感情一直很浓、很深。为了保护长江母亲河的健康，近年来，九江认真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协同推进长江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力做好中央环保督察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警示片反馈问题整改，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大力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开展小化工企业出清，整治非法码头和入河排污口，实施长江、鄱阳湖等重点水域全面退捕禁捕，全面完成长江干流江西段崩岸应急治理工程，大力推进无废城市、海绵城市建设，一条集“守护长江、美化长江、展示长江”于一体的沿江生态廊道基本成型。

如今，沿着长江边漫步，水清岸美，胜景无边，沁人心脾的绿色气息和穿越千年的文化魅力，伴着习习江风，浸润了九江整座城市。杨柳垂堤，琵琶亭、浔阳楼、锁江楼相望矗立，尽显“浔阳江头”的古雅；烟波浩渺，一湖清水入江、一江碧水东流，尽展“浪下三吴”的豪迈。

作为生态环境的“晴雨表”，大自然的精灵——动物们的选择最有说服力。随着生态环境的好转，长江鄱阳湖流域的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恢复，长江江豚数量从2017年的1012头增加到2022年的1249头，鳊鱼、刀鲚等一批多年未见的水生物种也重现江河湖泊，“水中大熊猫”桃花水母再现庐山西海。在九江鄱阳湖区域，每年约有70万—80万只候鸟越冬，有着“飞时不见云和日，落时不见湖边草”的壮观景象。

感恩奋进 向江图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期间，强调要建设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为九江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标定了新的高度。九江把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作为管总的目标，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打造区域制造业中心、区域文旅中心、区域航运中心和建设富裕美丽文明和谐幸福的美好家园为重点，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扬长补短、固本兴新，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九江篇章。

当前的九江，抢抓机遇的势头正劲，乘势而上的氛围更浓。九江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超常规纳规核准，正在朝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打造世界领先的绿色智能炼化企业”目标奋力前行；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加快构建水陆空运输无缝对接、“公水铁”多式联运、通关贸易一体化的现代运输体系，大力发展口岸经济，着力打造江西融入长江经济带、对接长三角的桥头堡；庐山管理体制改革迈出坚实步伐，交通体系优化、国资国企改革、不动产确权、行政管理体制优化等重点改革事项扎实推进，“庐山天下悠”的品牌进一步做实唱响；充分发掘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加快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城区段三期和瑞昌铜岭铜矿考古遗址公园、湖口山江湖生态文明展示园、彭泽滨江文旅融合等项目，致力把九江打造成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上的璀璨明珠。

（作者系江西省九江市委书记）



从文物看『多元、融合、开放、同心』的广西古代文明

走进广西壮族自冶区博物馆——

□ 韦江

起海上丝绸之路的风帆，多元文化在此交相辉映、共放光彩。隋唐两宋时期，广西海陆交通区位优势显现，经济社会加速发展。元明清时期，广西在维护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中发挥积极作用，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珍贵的人文精神财富。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以下简称“广西博物馆”）成立于1934年，是国家首批一级博物馆。现有藏品近10万件（套），其中一级文物148件（套）、二级文物1974件（套）、三级文物3865件（套）。馆藏文物种类丰富、涵盖面广，历史跨度从旧石器时代直到近现代，见证了广西各个时期的历史发展和演变。

翔鹭纹铜鼓

翔鹭纹铜鼓1976年出土于广西贵县（今贵港市）罗泊湾一号墓，为西汉时期的文物，是目前所见考古出土文物中最为精美、最为完整的一面铜鼓。其年代准确，可作为同类铜鼓断定年代的标准器。

铜鼓自春秋时期开始出现，曾广泛流行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它是各民族通过交往、交流、交融而共同孕育和形成的文化载体，也是这些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象征，凝聚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与文化价值。广西是古代铜鼓的主要分布区之一，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历经2000多年，鼓声绵延不绝。直至今日，广西的少数民族仍在铸造和使用铜鼓。在广西，铜鼓就是活着的历史文化，它以其独特而深远的魅力，成为文化传承和交流中的重要载体。

翔鹭纹铜鼓属于石寨山型铜鼓。鼓胸为六组羽人划船纹，其中三船的划船者皆戴羽冠，船头下方有銜鱼站立的鹭鹭和花身水鸟，呈现的是龙舟竞渡的写实画像。广西先民在原始时期就开始依水而居，船是他们的重要交通工具。鼓身出现的划船、捕鱼、竞技的画面，是我国早期行船、航海景象的见证。

翔鹭纹铜鼓整体的纹饰画面展示了一个大型集体舞的壮丽场面，其上的太阳芒纹、翔鹭纹等所表现出的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对鸟图腾等的崇拜，也是中华各民族所共有的文化符号，体现了各民族间共同的精神追求。

与翔鹭纹铜鼓伴随出土的，还有另外1件羽人划船纹羽纹铜鼓、2件半环钮钟、2件革鼓，以及羊角钮钟、铜锣、竹笛、越筑、十二弦琴等各1件。在这些乐器中，木腔革鼓、筑等可能是从中原传入，而铜鼓、羊角钮

钟、半环钮筒形钟等又具浓厚地方特色。经测音及研究发现，它们能够组合演奏出完美和谐的乐章。钟鼓和鸣，琴弦律动，既是当时文化艺术发展的重要见证，也代表了本地乐器与外来乐器的融合发展，是南北文化艺术交融的重要体现。

关于翔鹭纹铜鼓所在的罗泊湾一号墓的墓主人，由于该墓葬早年被盗，缺乏能够直接证明墓主人身份和族属的器物，因此相关研究存在多种争议。其一认为是南越国时期桂林郡的郡守或郡尉；其二认为是受南越国册封为王侯的骆越族首领；其三认为可能是受南越王册封的当地土著首领——西瓯君。尽管墓主人的具体身份扑朔迷离，但这一墓葬所反映出的中原文化与岭南越人文化的交融是不可否定的。从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来看，汉式铜鼎、壶、钫、盘、灯、匱、匱等，主要呈现出中原的文化特点；而从棺槨底部设置腰坑的葬式和出土的越式鼎、铜桶等器物来看，则具有浓厚的岭南越文化特征。

此外，罗泊湾一号墓的所在地贵县，在秦代时曾是桂林郡的郡治布山所在地。南越国时期，赵佗击并桂林郡和象郡后，在此实行“和辑百越”的政策，即以越制越，吸收越人进入政权；入境随俗，遵从越人风俗习惯；促进融合，大力提倡汉越通婚；因地制宜，让部分越人“自治”等。此举增进了岭南越人与汉人互相了解，使越汉关系更为密切，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融合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羽纹铜凤灯

除了翔鹭纹铜鼓，广西博物馆还有一对镇馆之宝，它们就是两件出土于广西合浦望牛岭西汉晚期墓葬中的羽纹铜凤灯。

这两件羽纹铜凤灯，外观、大小几乎一模一样，被认为是雌雄一对，与古籍中所述的“雄者为凤，雌者为凰”相吻合，因此也被称为“凤凰灯”。

两灯均为全铜铸造，为站立的风鸟形，顾首回望，双足分立，尾羽下垂及地。凤鸟背部有一圆孔，用以放置长柄灯盏。凤鸟口内衔喇叭形灯罩，垂直对准灯盏蜡柱上方。凤鸟颈部由两段套管衔接，可以自由转动和拆卸。灯罩与颈部及腹腔相通，腹腔中空，可以贮水。当灯盏中的灯芯点燃时，烟灰经过灯罩纳入颈管，再由颈管导入腹腔，溶入水中。这种巧妙设计能防止烛烟污染空气，保持室内清洁卫生。其制作工艺精湛，令人



▲翔鹭纹铜鼓

▲弦纹玻璃杯

▲羽纹铜凤灯

惊叹，是广西出土西汉铜器的精品。

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凤凰一直是祥瑞、安宁、幸福的象征。羽纹铜凤灯反映了凤凰崇拜在西汉时期已传到岭南地区，体现了凤凰崇拜是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和共有的精神信仰。此外，羽纹铜凤灯通体细刻着精美华丽的羽毛，所使用的是当时岭南西部独有的篆刻工艺，即用坚硬、精细的金属工具，在铸造的铜器外表篆刻和镂空出繁缛精致的几何纹样和动植物图案，使铜器显得精美华丽。这种篆刻工艺，是广西地区工匠对中国青铜工艺的重大贡献。

羽纹铜凤灯的制作，寄托了广西工匠对中华民族“天下大安宁”的美好愿望，也反映中原文化与本地技艺的交相辉映和融合发展。

羽纹铜凤灯的主人，即合浦望牛岭一号汉墓的墓主人庸毋，他来自于西汉时期的豪族“庸”氏家族。此外，望牛岭一号墓还出土了“庸毋印”龟钮琥珀印章、“九真府”朱书陶提筒和“九真府口器”朱书陶提筒残片等随葬品。根据唐代李贤注《后汉书·张湛传》的解释，“九真府”即九真郡的郡府。可以推测墓主庸毋生前可能曾任九真郡（今越南清化、河静等地）太守，死后归葬合浦家族墓中。这一墓葬的发现，不仅为探讨汉代墓葬制度和岭南地区文明进程提供了重要材料，也印证了史籍中关于汉朝以合浦为支点经略岭南及开展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记载。

弦纹玻璃杯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是指汉武帝平南越，设置合浦等九郡后，由官方主导开通从今广西合浦、广东徐闻等地出发，沿太平洋、印度洋海岸航行，与东南亚、南亚甚至更远的西亚、地中海地区进行经济、文化往来的海上交通路线。这是我国第一条有史料记载的官方与外国交往的航海线路，它的开通，为后世跨地域间的经济文化

交流提供了宝贵的通道。

广西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向内陆及东南沿海延伸和辐射的重要节点。当时，从合浦港出发的航船，已经能穿过马来西亚到达缅甸南部、印度、斯里兰卡和印度洋西海岸。当时出海的人，常常是带着黄金和丝织品，到南洋去购买“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等。

其中的“璧流离”，即玻璃，也叫“料器”。据史料记载，西亚和地中海东部沿岸国家约公元前2500年就已出现玻璃器，是世界上最早生产玻璃的地区。大约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才开始烧造玻璃。到了汉代，由于当时统治者对玻璃器的追求，国产玻璃无法完全满足需要，极大刺激了外产玻璃的进口。这些玻璃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合浦登陆后，被运到郁林（今贵县）、苍梧（今梧州），由内河转运到全国各地。

1987年，为配合南宁至合浦二级路建设，广西考古队在文昌塔墓区发掘了近200座汉墓，弦纹玻璃杯被发现于第70号墓中。此杯为蓝料烧制而成，经压膜成型后，精细抛光，呈半透明淡青色。杯形为敛口，弧腹，自腰下内收，小平底，腹部饰三道弦纹，这种独特的凸弦纹装饰在同时代地中海地区是没有发现过的。经检测分析，这件弦纹玻璃杯属于中等钙铝钾玻璃，既不同于西方的“洋玻璃”，又有别于中原的铅钡玻璃。这种钾玻璃在印度一带很早就有大规模生产，因此，这件玻璃杯应是通过海上贸易从印度南部传入广西的。

除了弦纹玻璃杯，在广西合浦境内发掘的数百座汉墓中，已有80余座

汉墓发现有玻璃制品。通过对这些玻璃制品进行的抽样化学成分分析发现，它们分属于多种不同的玻璃化学成分体系。其中既有来自海外的钠钙玻璃，也有本地自制的铅钡玻璃，还有数量众多的钾铯酸盐玻璃。经过进一步对合浦地区部分钾玻璃进行铅同位素分析发现，它们与我国其他地区的玻璃样本采用相同的铅矿资源，且着色的钴料具有中国矿料独特的高锰特点，可以推断广西汉代的钾玻璃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广西先民以自己的实践经验、采用国产钴料炼制的。这是继中国自制的铅钡玻璃系统之后，又一种具有中国地方特色的早期古代玻璃。这也说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不仅带来了经济贸易的交往，也带来了文化和技术的交流。

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基石，更是深刻体现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这种精神，如同一条纽带，连接着不同文明，推动世界向着更加和谐、繁荣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广西博物馆充分利用这些馆藏文物，举办了一系列陈列展览。其中“广西古代文明陈列”和“合浦启航——广西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是对这些馆藏特色文物的充分利用，也是最能体现广西历史文化特色的两个原创性基本陈列。前者展示广西古代文明的演变进程，彰显广西在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后者是前者的深化与拓展，讲述广西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独特地位，两者共同阐释广西古代文明“悠久、多元、融合、开放、同心”的特点。

（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馆长）

